

# 国际化董事会、审计师行业专长与税收规避

谭 雪,杜兴强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通过手工收集2004~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国际化董事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避税显著负相关,能够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行业专长审计师也有减少企业避税的作用,能够调节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关键词] 国际化董事会;审计师行业专长;税收规避

[中图分类号] 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556(2015)11-0113-12

## Globalization Board, Auditor Industry Expertise and Tax Avoidance

TAN Xue, DU Xing-q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board on tax avoidance. Using hand collected data of globalization board from 2004 to 2012, we find strong evidence that tax avoidanc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firms with a globalization board. In addition, firms audited by industry experts avoid less tax. Furthermore, the study finds that auditor industry expertise attenuated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board on tax avoidance, indicating that globalization board and industry experts have a substitute effect on supervise firm's tax avoidance. This study enriches literature of the governance role of globalization board, and extend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ax avoidance.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board; auditor industry expertise; tax avoidance

### 一、引言

企业避税问题已受到实务界和监管机构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于2008年修订的《企业所得税法》首次引入“一般反避税”规定,并于2015年2月实施了《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成为税务部门打击企业避税行为的重要法律依据。国际上,2013年二十国集团(G20)委托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研究了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行动计划”(BEPS),该计划旨在应对企业因人为原因导致的应税利润减少甚至“消失”,或将利润转移至低税负国,

从而减少税收缴纳的行为。企业的避税不仅会导致国家的税基受到侵蚀,使税收收入直接减少,还可能扭曲市场资源配置,损害竞争效率(Bankman, 2004<sup>[1]</sup>)。因此,如何有效规制企业的避税行为,是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的一项重要议题。

Desai等(2007)<sup>[2]</sup>认为,公司治理质量是影响企业纳税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董事会是这一环节的核心(Schön, 2008<sup>[3]</sup>),董事会有责任监督企业的纳税行为,董事会具有监督管理层经营活动和为企业战略提供咨询服务的职能。在董事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收稿日期] 2015-10-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制度环境、政治联系、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行为”(7107205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政治联系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数据挖掘与实证研究”(13JJD790027);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博导类)“半年报自愿审计、代理成本与公司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201201211110007)

[作者简介] 谭雪(1988-),男,湖南浏阳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资本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杜兴强(1974-),男,山西芮城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资本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

中,部分学者发现,董事会引入外籍董事组成的国际化董事会(Globalization Board)有着较强的治理作用,如国际化董事会使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得到提升(Masulis et al.,2012<sup>[4]</sup>),增加公司的价值(Oxelheim and Randoy,2003<sup>[5]</sup>)。那么,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它能否有效监督企业的纳税行为?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以我国2004~2012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发现国际化董事会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避税程度,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审计师行业专长可以减少企业避税,审计师具有抑制企业避税行为的外部治理作用;审计师行业专长调节了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说明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会产生交互影响。

本研究的贡献和意义在于:(1)Hanlon和Heitzman(2010)<sup>[6]</sup>呼吁要重视公司治理对避税行为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可以有效监督管理层的经营活动,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这一发现的政策意义在于,政府对企业避税行为的规制不仅可以从宏观层面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还可以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微观角度进行管理,通过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来约束企业的避税行为;(2)现有关于企业避税原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所有权结构(Chen et al.,2010<sup>[7]</sup>)、管理层行为(Dyreng et al.,2010<sup>[8]</sup>)等方面,本文则从组织合法性、董事会监督和履行社会责任的视角研究了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丰富了企业避税行为的相关研究;(3)以往的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具有咨询职能,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国际化董事会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避税程度,这为国际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丰富了国际化董事会的相关研究;(4)本文不仅发现行业专长审计师审计的企业避税程度降低了,而且发现行业专长审计师和国际化董事会在约束企业避税方面存在替代效应,这不仅进一步支持了审计师是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Fan and Wong,2005<sup>[9]</sup>)的观点,而且为不同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即企业可以利用不同治理机制的交互作用达到治理目的。

## 二、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假设的提出

### (一)制度背景

1994年中央政府为了统一财权和事权,解决财政倒挂的问题,实施了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按照税种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形成了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收结构(近年来,流转税占60%左右,所得税占20%左右)。其中,流转

税又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增值税的征收主要由国税局负责。鉴于增值税在政府税收收入中具有重要作用以及在增值税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伪造、倒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偷逃税问题,税务主管部门于1994年针对增值税征缴实施了“金税”工程,利用信息技术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缴纳构造了一个严密的监控体系。流转税中的营业税税基主要为营业额,营业额的确定较为简单、直接。总体而言,企业利用流转税进行避税的空间相对较小(吕冰洋和郭庆旺,2011<sup>[10]</sup>)。然而,企业所得税有所不同。企业所得税是以企业的应税利润为征税对象,应税利润的确定需经过企业复杂的成本费用配比,税务部门无法对此进行直接观察,从而使所得税税基的确定具有可操纵性。另外,在所得税的征管方面,国税局和地税局均有一定的征管权限,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扶持地方企业发展、解决就业问题等,制定了各种所得税优惠政策,形成所得税的“政策洼地”,给所得税避税留下了一定的空间(甘强生等,2012<sup>[11]</sup>)。本文所指的避税主要是所得税的避税。

### (二)文献回顾

1.企业避税行为的相关研究。纳税是企业的一项基本义务,而避税可以减少企业的现金流出,再加上税法制定和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漏洞,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有动力进行税收规避,以减少税收缴纳。同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制度等存在差异,各国的税负水平、税收政策、税收优惠也不尽相同,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各国间不同的税收规定进行避税活动。企业的避税行为是各国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学术领域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避税动机、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及避税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企业的避税行为是管理层操作的,是企业薪酬契约导致的直接后果(Slemrod,2004<sup>[12]</sup>)。Phillips(2003)<sup>[13]</sup>研究了以税后会计业绩为基础决定CEO及分部经理薪酬的企业实际税率是否更低,发现以税后会计业绩为基础确定分部经理薪酬的企业确实有着更低的实际税率,而以税后会计业绩为基础对CEO进行薪酬支付的企业则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Armstrong等(2012)<sup>[14]</sup>通过收集大型企业披露的负责公司税务的董事的薪酬数据,发现薪酬越高的税务董事,其所在的企业实际税率越低,说明这些企业希望通过激励税务董事来降低实际税率。Rego和Wilson(2012)<sup>[15]</sup>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经理人的权益风险与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这些研究表明,管理层想获取相应的薪酬,是企业进行避税的动机之一。



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权结构方面,Chen 等(2010)<sup>[17]</sup>发现,家族企业的避税程度比非家族企业的避税程度更低,其原因是家族企业害怕避税带来的处罚及对声誉的负面影响。吴联生(2009)<sup>[16]</sup>基于 1998~2006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显示,企业的实际税负随着国有股权的增加而提高,国有企业承担的税负更重。在市场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政治联系和政府行为也会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罗党论、魏翥,2012<sup>[17]</sup>)。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sup>[18]</sup>认为,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身份能为其避税带来便利,具有政治身份的民营企业会采取税收规避行为,且政治身份越高的企业避税行为越明显。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sup>[19]</sup>则发现,税务部门的征管行为会影响企业的避税,以 2002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为自然实验的研究结果显示,地税局执法不力导致了大范围所得税避税行为的出现。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府的税收征管行为可以得到一定的规范(刘慧龙、吴联生,2014<sup>[20]</sup>)。

避税行为究竟会对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理论上说,企业通过避税将原本应上缴国家的税收转化为自身的收益,有可能提高企业价值。然而,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企业的避税行为并不必然提高企业价值,而是取决于公司的治理水平(Desai and Dharmapala, 2009<sup>[21]</sup>),公司治理水平较低企业的避税行为可能会损害其价值。江轩宇(2013)<sup>[22]</sup>发现,避税行为为管理层的寻租提供了便利,使得这些企业股价崩盘的风险更高。避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还可能因复杂的税务交易和筹划而影响市场对企业信息的理解(吕伟等,2011<sup>[23]</sup>),避税还可能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戴德明、王小鹏,2011<sup>[24]</sup>)。

2. 国际化董事会的相关研究。在董事会治理作用的相关研究中,部分学者注意到国际化董事会所起的作用。国际化董事会即董事会聘请外籍人士担任董事所组成的董事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人力资本跨国界流动成为一种常态,越来越多的公司董事会中出现了外籍人士。Gillies 和 Dickinson(1999)<sup>[25]</sup>调查了世界最大的 80 家跨国公司,发现这些大型跨国公司聘请外国董事的比例为 36.3%。Staples(2007)<sup>[26]</sup>跟踪调查了这 80 家跨国公司,发现它们聘请外国董事的比例提高到 75%。国际化董事会将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以及成长于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下的人士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行为必然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现有关于国际化董事会的研究多集中于国际化董事会的咨询作用。Masulis 等(2012)<sup>[4]</sup>基于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董事会聘请外国独立董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发

现外国独立董事可以提高企业在国外独立董事来源国的并购绩效,因为这些外国独立董事更了解本国市场,可为并购方案提供有用的信息,扮演了很好的咨询角色。他们还发现,这些外国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公司治理比较完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而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董事在治理方面所起的边际作用较小,这使得他们的监督效率没有明显改善。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聘请外籍董事来说,情况可能相反。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还不完善,来自于公司治理较为完善国家的外籍董事可以为中国公司带来先进的治理理念,起到较好的监督作用。本文试图从企业避税的角度出发,探讨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以期丰富国际化董事会治理后果的相关研究。

### (三) 假设的发展

组织合法性理论提出,企业是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组成部分,企业的生存要符合合法性规则。合法性也成为企业获取外界资源,进行战略管理的一种手段(Suchman, 1995<sup>[27]</sup>)。组织合法性包含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Scott, 2001<sup>[28]</sup>),显然,从性质上来说,企业按照税法的规定缴纳税款是规制合法性的基本内容。国际化董事会的外籍董事大多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欧美国家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外籍董事从小生活在法制社会中,受法制的影响比较大。法制社会注重法律和契约的遵循,外籍董事普遍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会监督管理层的经营行为,以使其符合法律规范。避税行为无益于企业对法律的遵循,也不符合组织合法性的要求。组织合法性是对企业行为一致性的一种展现(Parsons, 1960<sup>[29]</sup>),其他利益相关者有理由认为,一个不遵循税收法规的企业在其他法律的遵循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反之,当企业的行为符合合法性时,企业更容易获得外界的支持和信任,也更容易从外界获取相应的战略资源。拥有国际化董事会的企业大多制定了海外发展战略,具有市场扩张的需求,外界的认可 and 资源的提供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从组织合法性的角度来说,国际化董事会更可能促使企业减少税收规避,按照规定缴纳税款。

企业的避税虽然可以部分减少税收的缴纳,但避税行为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首先,避税行为被查处和揭发之后,企业将面临税务部门的高额处罚,由此会给企业的形象和声誉造成损失(吕伟等,2011<sup>[30]</sup>)。其次,避税活动的实施通常较为隐蔽,不易被外界察觉,避税活动常常成为管理层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工具。避税活动与盈余管理密切相关

(Dhaliwal et al., 2004<sup>[31]</sup>)。Cook 等(2008)发现,未达到分析师一致预测的企业会给审计师支付更多的税务服务费用,以期在审计师的协助下降低第三和第四季度的有效税率,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另外,企业的避税活动通常涉及复杂的避税交易,可能会给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留下可操作的空间(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刘行和叶康涛(2013)发现,避税程度高的企业更可能产生过度投资。Kim 等(2011)则发现,避税活动为管理层隐瞒坏消息和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避税行为越激进的企业股价崩盘的风险也越高。国际化董事会具有较强的监督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避税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国际化董事会的外籍董事有两类,即外籍执行董事和外籍独立董事。对于外籍执行董事来说,他们出现在国际化董事会主要是受外资股东的派遣,维护外资股东的利益是外籍执行董事的应尽职责,他们有动力监督企业的避税及与避税相关的管理层自利行为。在全球化和跨国经营占主导的背景下,企业的避税手段复杂多样,如利用避税地设立控股公司,通过间接股权转让、资本弱化、转让定价等方式进行避税。对于不了解国外制度背景和税收环境的本土董事,他们可能既无法准确理解管理层复杂的避税交易,也不清楚海外避税所隐含的法律风险,也无法对管理层的避税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与本土董事不同,外籍执行董事特殊的工作经历使他们更熟悉和了解不同国家的商业环境、市场需求、税收制度等(Alli et al., 2010),他们有能力发现管理层利用避税活动谋取私利的行为,从而对企业复杂的避税交易提出质疑。对于外籍独立董事而言,中国上市公司的外籍独立董事大多来自于个体意识盛行的国家和地区(如英、美),他们的成长环境不同于中国的“人情社会”和“关系社会”,其在行为方式和处理事务方面更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体的自治,不太可能融入本土董事的“圈子”,也不太可能形成“小团体”,因而他们有着更强的独立性,不会轻易被管理层“俘获”。面对管理层激进的避税行为,外籍独立董事提出异议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国际化董事会的监督有可能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

企业缴纳的税款是政府提供医疗、卫生、教育、国防等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重要资金来源。避税活动会侵蚀国家的税基,造成国家税收收入减少,给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按照规定缴纳相应的税款,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维度。国际化董事会有可能促使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减少避税活动。积极缴纳税款、进行慈善捐赠等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有助于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尤其是对于

转型时期的我国企业来说,政府拥有较大的资源分配权,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在资源的获取上得到政府的“照顾”,而税收规避行为会减少政府的收入,不利于企业与政府建立关系,甚至可能弱化与政府的关系。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异质特征明显的外籍董事更容易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他们比本国董事更注重自身的执业行为和声誉风险。一旦企业的避税行为被社会揭露,就会给国际化董事带来严重的公关危机和社会压力,同时也会对外籍董事在中国的长远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国际化董事会更可能敦促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Lanis 和 Richardson(2012)基于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其避税程度越低。Hoi 等(2013)也发现,承担社会责任少的企业,其避税程度显著高于承担社会责任多的企业。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H1。

H1: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

企业在参与全球化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公司治理的难度随之增大,避税行为也变得更为复杂。审计师是重要的外部监督机制,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可以企业对企业的避税活动起到监督和抑制作用。前已述及,避税活动可能成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而且避税活动通常涉及到收入、成本及费用等的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进而影响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和财务信息质量,增加审计的难度和审计失败的风险。一方面,审计师利用其专业知识可以发现管理层避税活动带来的风险。企业避税程度越高,与避税相关的交易和盈余管理就可能越复杂。审计师为了避免潜在的诉讼风险和审计失败造成的声誉损失,有动机监督企业的避税行为,从而在审计过程中投入更多的审计成本(Donohoe and Knechel, 2014)。另一方面,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能够识别企业的避税活动。谢盛纹和田莉(2014)发现,经行业专长审计师审计的企业,其避税程度明显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会对避税活动保持职业怀疑和职业谨慎,对避税程度严重的企业出具的审计报告也更加严厉。另外,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通常对企业所在行业的税收法规和税收政策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他们会设计合理的审计程序用于识别和发现企业的避税活动。管理层是理性的经济人,考虑到避税活动被审计师揭露可能会给企业及其自身带来负面影响,以及避税活动可能导致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他们会主动减少避税以及与避税相关的机会主义行为。

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途径有所差



异,公司治理机制之间也会产生交互影响。审计师可以起到公司治理的作用,成为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一种替代(Choi and Wong,2007;Sun and Liu, 2011)。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国际化董事会与审计师行业专长之间可能存在替代关系。首先,审计师行业专长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可以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治理的相关信息,同时也可以减少国际化董事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国际化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国际化董事会监督企业避税行为的时间和投入就相应减少。其次,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一般具有较高的审计质量,其对企业所处的行业较为熟悉,行业知识和行业经验有助于他们发现企业的避税手段,从而对企业的避税活动起到较好的监督和抑制作用。在行业专长审计师能够监督企业避税活动的情况下,国际化董事会可以将精力投入到企业的其他经营活动上,因而行业专长审计师能够调节国际化董事会对避税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H2。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业专长审计师调和了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避税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 三、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研究区间为 2004~2012 年,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了在生产方式和财务特征方面与其他行业存在显著差别的金融、保险及证券行业样本;(2)剔除了变量缺失的样本。本文最终得到的观测值为 11 217 个。本研究所需的国际化董事会数据,笔者从 CSMAR(国泰安数据库)下载高管简历手工搜集得到,其他数据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或根据 CSMAR 的数据计算得到。为了避免样本数据中出现的极端值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 1%和 99%分位的 Winsorize 处理。

#### (二)模型和变量设计

为了检验假设 H1,我们设计了如下回归模型:

$$\begin{aligned} \text{DDBTD} = & \beta_0 + \beta_1 \text{GB} + \beta_2 \text{PPE} + \beta_3 \text{INVINT} + \beta_4 \text{INTINT} + \\ & \beta_5 \text{INCINT} + \beta_6 \text{OVEINC} + \beta_7 \text{FIRST} + \beta_8 \text{INDR} + \beta_9 \text{BOARD} + \\ & \beta_{10} \text{DUAL} + \beta_{11} \text{SIZE} + \beta_{12} \text{LEV} + \beta_{13} \text{CFO} + \beta_{14} \text{ROA} + \beta_{15} \text{MTB} + \\ & \beta_{16} \text{ST} + \beta_{17} \text{MKT} + \beta_{18} \text{STATE} + \lambda \text{INDUSTRY} + \sigma \text{YEAR} + \varepsilon \end{aligned} \quad (1)$$

企业的避税活动指标有多种计算方法。Desai 和 Dharmapala(2006,2009)认为,账面税负与实际税负的差异能够较好地刻画企业的避税程度,他们构建的避税指标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得到认可(李维安、徐业坤,2013;金鑫、雷光勇,2011)。因此,我们在模

型(1)中参考 Desai 和 Dharmapala 的方法,用 DDBTD 来衡量避税程度。该指标的计算如下: $\text{BTD}_{i,t} = \alpha \text{TACC}_{i,t} + \mu_i + \xi_{i,t}$ 。其中,TACC 为总的应计利润, $\text{TACC} = (\text{净利润} - \text{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 \text{滞后一期总资产}$ , $\text{BTD} = (\text{税前会计利润} - \text{应纳税所得额}) / \text{滞后一期总资产}$ ,表示会计-税收差异。 $\text{DDBTD} = \mu_i + \xi_{i,t}$ , $\mu_i$  表示企业税负不随时间变化的固有部分, $\xi_{i,t}$  表示税负差异中变动的部分,DDBTD 表示 BTD 中不能被应计利润解释的部分。同时,我们也将 BTD 指标用于稳健性检验。

对于国际化董事会的度量,我们借鉴了 Masulis 等(2012)<sup>[4]</sup>的做法,即聘请了外籍人士的董事会为国际化董事会。由于我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与祖国大陆存在差异,我们在研究中将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统称为“外籍人士”。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考察只有外国人的国际化董事会以及“外籍人士”加上华裔的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GB(Globalization Board)为衡量国际化董事会的变量,它包括两个指标,一是董事会是否为国际化董事会(GBD),二是董事会的国际化程度(GBR),指标的具体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DDBTD	扣除应计利润影响的会计-税收差异, $\text{BTD}_{i,t} = \alpha \text{TACC}_{i,t} + \mu_i + \xi_{i,t}$ ,其中, $\text{DDBTD} = \mu_i + \xi_{i,t}$ , $\text{BTD} = (\text{税前会计利润} - \text{应纳税所得额}) / \text{滞后一期总资产}$ , $\text{TACC} = (\text{净利润} - \text{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 / \text{滞后一期总资产}$
	GBD	国际化董事会的虚拟变量,若公司董事会含外国人或港澳台人士,则GBD=1,否则为0
解释变量	GBR	国际化董事会的比例变量,即公司董事会中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占公司所有董事的比例
	AUD	审计师行业专长的虚拟变量,若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所在省份、所在行业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则其取值为 1,否则为 0(市场份额是基于客户销售收入计算的)
控制变量	PPE	固定资产比例,即固定资产净额/上期末资产总额
	INVINT	存货比例,即存货净额/上期末资产总额
	INTINT	无形资产比例,即无形资产净额/上期末资产总额
	INCINT	投资收益,即投资收益/上期末资产总额
	OVEINC	海外收入比例,即海外收入/上期末资产总额
	FIRST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NDR	独立董事比例,即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续表 1)

控制变量	BOARD	董事会规模,用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度量
	DUAL	两职合一虚拟变量,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则 DUAL=1,否则为 0
	SIZE	公司规模,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度量
	LEV	资产负债率,即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CFO	自由现金流,即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上期末资产总额
	ROA	总资产收益率,即净利润/资产总额
	MTB	市值账面价值比,即市场价值/账面价值
	ST	若上市公司被 ST、*ST、PT,则 ST=1,否则为 0
	MKT	樊纲等(2011)提供的市场化指数
	STATE	公司产权性质的虚拟变量,若上市公司为国有,则 STATE=1,否则为 0
敏感性测试变量	OFFAIR	公司办公地 100 km 之内国际机场的个数
	FSHR	境外机构或个人持股比例
	POP	公司所在省份人口的自然对数
	GDP_PC	公司所在省份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

为了检验假设 H2,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行业专长审计师(AUD)及国际化董事会与行业专长审计师的交乘项(GB×AUD),构建了模型(2):

$$\begin{aligned} \text{DDBTD} = & \beta_0 + \beta_1 \text{GB} + \beta_2 \text{AUD} + \beta_3 \text{GB} \times \text{AUD} + \beta_4 \text{PPE} + \\ & \beta_5 \text{INVINT} + \beta_6 \text{INTINT} + \beta_7 \text{INCINT} + \beta_8 \text{OVEINC} + \beta_9 \text{FIRST} \\ & + \beta_{10} \text{INDR} + \beta_{11} \text{BOARD} + \beta_{12} \text{DUAL} + \beta_{13} \text{SIZE} + \beta_{14} \text{LEV} + \beta_{15} \\ & \text{CFO} + \beta_{16} \text{ROA} + \beta_{17} \text{MTB} + \beta_{18} \text{ST} + \beta_{19} \text{MKT} + \beta_{20} \text{STATE} + \\ & \lambda \text{INDUSTRY} + \sigma \text{YEAR} + \varepsilon \end{aligned} \quad (2)$$

#### 四、实证研究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 2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避税程度指标 DDBTD 的均值为-0.000 3,中位数为 0.004 7,标准差为 0.069 8,说明样本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避税;拥有国际化董事会(GBD)的上市公司约占样本的 5.90%,说明国际化董事会在上市公司中的比例较低,大多数上市公司对董事的遴选集中在国内;董事会国际化程度(GBR)的均值为 0.93%,说明董事会的国际化程度较低,且最高值为 28.57%,说明董事会的国际化程度差异较大。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样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p25	中位数	p75	最大值
DDBTD	11217	-0.0003	0.0698	-0.2918	-0.0159	0.0047	0.0211	0.2710
GBD	11217	0.0590	0.2357	0	0	0	0	1
GBR	11217	0.0093	0.0408	0	0	0	0	0.2857
AUD	11217	0.4371	0.4961	0	0	0	1	1
PPE	11217	0.3004	0.2113	0.0029	0.1390	0.2572	0.4290	0.9719
INVINT	11217	0.2063	0.2002	0	0.0760	0.1521	0.2598	0.9931
INTINT	11217	0.0521	0.0650	0	0.0120	0.0323	0.0655	0.3834
INCINT	11217	0.0083	0.0212	-0.0328	0	0	0.0075	0.1245
OVEINC	11217	0.0812	0.1703	0	0	0	0.0802	0.8741
FIRST	11217	0.3671	0.1543	0.0891	0.2429	0.3480	0.4842	0.7500
INDR	11217	0.3626	0.0509	0	0.3333	0.3333	0.3750	0.5556
BOARD	11217	2.1930	0.2010	1.6094	2.1972	2.1972	2.1972	2.7081
DUAL	11217	0.1802	0.3843	0	0	0	0	1
SIZE	11217	21.6429	1.2300	18.6162	20.8085	21.5030	22.3039	26.3261
LEV	11217	0.4959	0.2594	0.0454	0.3272	0.4949	0.6398	2.1897
CFO	11217	0.0538	0.1027	-0.2932	0.0026	0.0504	0.1064	0.3858
ROA	11217	0.0397	0.0706	-0.3286	0.0132	0.0373	0.0690	0.2986
MTB	11217	0.5654	0.2524	0.0907	0.3664	0.5488	0.7531	1.6647
ST	11217	0.0230	0.1499	0	0	0	0	1
MKT	11217	9.0110	2.2860	3.5400	7.3600	9.0200	10.6843	14.2551
STATE	11217	0.5592	0.4965	0	0	1	1	1

本中约有 43.71%的上市公司由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进行了审计;企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PPE)的 30%左右,存货比例(INVINT)的均值为 20.63%,无形资产的比 例(INTINT)为 5.21%,投资收益比例

(INCINT)的均值为 0.83%,海外收入比例(OVEINC)的均值为 8.12%。在公司治理特征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的均值为 36.71%,一股独大的情况仍然存在;独立董事比例(INDR)为 36.26%,独立

董事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满足监管需要;公司董事会规模的自然对数 (BOARD) 均值为 2.193 0; 约有 18.02% 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 (DUAL), 而大多数上市公司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务进行了分离。在企业财务特征的控制变量方面, 企业规模的自然对数 (SIZE) 为 21.642 9, 资产负债率 (LEV) 的均值为 49.59%, 企业产生的自由现金流 (CFO) 约占资产的 5.38%, 资产收益率 (ROA) 为 3.97%, 账面市值比 (MTB) 为 0.565 4, 有 2.3% 的上市公司被 ST。另外, 市场化指数 (MKT) 的均值为 9.01, 样本中约有 56% 的公司为国有企业。

## (二)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从表 3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来看, 是否为国际化董事会 (GBD) 与企业避税程度 (DDBTD) 负相关, 董事会国际化程度 (GBR) 与企业避税负相关, 说明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国际化董事会可能会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该结果与假设 H1 的理论预测较为一致, 初步印证了假设 H1。固定资产比例、投资收益比例、海外收入比例、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自由现金流、资产收益率、市场化程度等均与企业避税程度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而资产负债率、账面市值比、是否 ST、是否为国企等则与企业避税显著负相关。以上相关性分析是单变量检验结果, 更为稳健可靠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

表 3 Pearson 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DDBTD	1									
FGATDD	-0.0104	1								
FGATDR	-0.0127	0.9070***	1							
AUD	-0.0011	-0.0071	-0.0024	1						
PPE	0.0470***	0.0104	0.0147	0.1024***	1					
INVINT	-0.0063	-0.0164*	-0.0155	-0.0144	-0.3094***	1				
INTINT	0.0069	-0.0143	-0.0134	0.0227**	0.1243***	-0.1148***	1			
INCINT	0.2213***	-0.0144	-0.0235**	-0.0277***	-0.1027***	-0.0262***	-0.0071	1		
OVEINC	0.0400***	0.1091***	0.1129***	-0.0073	0.0239**	0.0376***	-0.0148	-0.0405***	1	
FIRST	0.0412***	0.0259***	0.0245***	0.0196**	0.0912***	0.0966***	-0.0125	-0.0467***	0.0177*	1
INDR	0.0224**	0.0025	-0.0094	-0.0110	-0.0650***	0.0287***	0.0071	0.0080	-0.0222**	0.0258***
BOARD	-0.0033	0.0456***	0.0360***	0.0817***	0.1832***	-0.0547***	-0.0109	-0.0201**	-0.0035	0.0109
DUAL	-0.0047	0.0460***	0.0400***	-0.0437***	-0.0990***	-0.0101	0.0001	-0.0418***	0.0597***	-0.0740***
SIZE	0.0723***	0.0618***	0.0339***	0.0951***	0.1676***	0.1661***	-0.0239**	0.0469***	-0.0082	0.2818***
LEV	-0.2303***	-0.0319***	-0.0390***	0.0325***	0.0686***	0.1921***	0.0019	-0.0384***	-0.0212**	-0.0284***
CFO	0.0696***	0.0428***	0.0463***	0.0710***	0.2866***	-0.2259***	0.1372***	-0.0669***	0.0477***	0.0788***
ROA	0.5373***	0.0401***	0.0398***	0.0159*	0.0075	0.0573***	0.0452***	0.1811***	0.0586***	0.1214***
MTB	-0.0249***	-0.0197**	-0.0175*	0.0711***	0.1231***	0.0766***	-0.0973***	-0.0809***	-0.0051	0.1095***
ST	-0.0489***	-0.0258***	-0.0175*	0.0171*	0.0629***	-0.0503***	-0.0056	0.0227**	-0.0402***	-0.0500***
MKT	0.0513***	0.0574***	0.0632***	-0.1539***	-0.2018***	0.0342***	-0.0407***	0.0631***	0.1734***	0.0094
STATE	-0.0271***	-0.0634***	-0.0880***	0.0605***	0.1946***	-0.0283***	-0.0042	0.0424***	-0.0723***	0.0214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DR	1									
BOARD	-0.3474***	1								
DUAL	0.0732***	-0.1379***	1							
SIZE	0.0542***	0.2630***	-0.1454***	1						
LEV	0.0035	0.0705***	-0.1013***	0.1700***	1					
CFO	-0.0453***	0.0712***	-0.0401***	0.0782***	-0.1299***	1				
ROA	-0.0003	0.0171*	0.0207**	0.1237***	-0.4187***	0.3278***	1			
MTB	-0.0338***	0.1394***	-0.1113***	0.4640***	0.1433***	-0.1107***	-0.2205***	1		
ST	-0.0103	-0.0266***	-0.0038	-0.0334***	0.1093***	-0.0456**	-0.1153***	0.0153	1	
MKT	0.0566***	-0.0868***	0.1277***	0.0691***	-0.1328***	-0.0534***	0.1007***	-0.0265***	-0.0589***	1
STATE	-0.0767***	0.2286***	-0.2290***	0.2994***	0.1496***	0.0730***	-0.0842***	0.2077***	0.0272***	-0.2168***

注: \*\*、\*、\*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双尾)。

### (三) 国际化董事会、行业专长审计师与税收规避:多元回归结果

1.国际化董事会与税收规避。假设 H1 的理论分析表明,国际化董事会有利于监督企业的避税活动,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表 4 的列(1)、(2)给出了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回归结果。列(1)对应的自变量为是否为国际化董事会(GBD),结果显示,是否为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避税在 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06 0,t 值为-2.37)。列(2)对应的自变量为董事会的国际化程度(GBR),结果显示,董事会的国际化程度与企业避税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41 8,t 值为-2.75),说明外籍董事在国际化董事会中所占比例每提高 1%,企业的避税程度会降低 4.18%,该边际影响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列(1)、(2)的结果表明,国际化董事会起到了抑制企业避税活动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外籍董事基于自身声誉和法律风险的权衡,会督促国际化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责,而且外籍董事本身也具备一定的监督能力,他们可以监督企业的避税行为;同时,国际化董事会在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会促使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使企业的经营行为符合合法性的相关要求,从而使国际化董事会的企业避税程度较低。由此,本文的假设 H1 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在控制变量方面,固定资产比例(PPE)与企业避税在 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固定资产所占比例越高,企业就越有可能进行税收规避,即利用固定

资产折旧进行避税操作;存货比例(INVINT)与企业避税在 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投资收益比例(INCINT)与企业避税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为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部分投资收益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企业可能利用这一政策进行了避税筹划;海外收入比例(OVEINC)与企业避税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为拥有海外收入的企业面临着本国与海外收入来源国不同的税收环境和制度,企业可能利用不同国家的税法规定及漏洞规避监管,达到避税目的;独立董事比例(INDR)与企业避税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独立董事主要由大股东或内部人控制,独立董事并非“实质性独立”,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监督作用;公司规模(SIZE)与企业避税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规模越大的企业受到的社会关注也越多,为了避免避税给企业造成负面影响,企业会减少避税行为;自由现金流(CFO)与企业避税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企业在面临现金流短缺时,更可能利用避税活动减少现金流出;资产收益率(ROA)与企业避税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资产收益率越高,需缴纳的税款越多,企业就越有可能通过避税来减少税款缴纳;账面市值比(MTB)与企业避税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发展机会越多的企业资金需求越大,也越有可能通过避税来减少现金流出,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列(2)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列(1)大致相同。

表 4 国际化董事会、行业专长审计师与企业避税

变量	假设H1				假设H2			
	(1)		(2)		(3)		(4)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GBD	-0.0060**	-2.37			-0.0107***	-3.10		
GBR			-0.0418***	-2.75			-0.0644***	-2.98
AUD					-0.0024***	-2.98	-0.0022***	-2.88
GBD×AUD					0.0109***	2.59		
GBR×AUD							0.0509**	2.01
PPE	0.0213**	2.19	0.0214**	2.20	0.0213**	2.19	0.0213**	2.19
INVINT	-0.0188**	-2.38	-0.0188**	-2.38	-0.0189**	-2.40	-0.0189**	-2.39
INTINT	0.0097	0.66	0.0097	0.66	0.0096	0.65	0.0096	0.65
INCINT	0.3766***	3.68	0.3761***	3.68	0.3754***	3.67	0.3752***	3.68
OVEINC	0.0075***	3.34	0.0076***	3.32	0.0080***	3.59	0.0080***	3.54
FIRST	-0.0059*	-1.72	-0.0057*	-1.68	-0.0057*	-1.67	-0.0056	-1.61
INDR	0.0398***	2.93	0.0394***	2.93	0.0405***	3.00	0.0401***	2.99
BOARD	-0.0039	-1.26	-0.0039	-1.23	-0.0037	-1.22	-0.0037	-1.19
DUAL	-0.0006	-0.30	-0.0006	-0.32	-0.0005	-0.24	-0.0006	-0.28
SIZE	-0.0048***	-3.08	-0.0048***	-3.14	-0.0047***	-3.02	-0.0048***	-3.08
LEV	-0.0001	-0.02	-0.0001	-0.03	-0.0001	-0.01	-0.0001	-0.02



(续表 4)

CFO	-0.0882***	-6.30	-0.0879***	-6.29	-0.0878***	-6.25	-0.0876***	-6.25
ROA	0.6129***	19.99	0.6131***	19.98	0.6135***	20.08	0.6135***	20.01
MTB	0.0543***	10.38	0.0544***	10.38	0.0547***	10.47	0.0547***	10.44
ST	-0.0001	-0.04	-0.0002	-0.02	-0.0001	-0.01	0.0001	0.01
MKT	-0.0001	-0.12	-0.0004	-0.09	-0.0001	-0.31	-0.0001	-0.28
STATE	0.0003	0.14	0.0001	0.08	0.0002	0.13	0.0001	0.07
CONS	0.0793**	2.23	0.0800**	2.28	0.0793**	2.23	0.0798**	2.27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217		11217		11217		11217	
R-squared	0.3588		0.3590		0.3593		0.3594	
F(p-value)	81.77*** (<0.0000)		81.82*** (<0.0000)		78.70*** (<0.0000)		78.53*** (<0.0000)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双尾),回归 t 值均依据 Peterson(2009)进行了 two-way cluster 调整。

2.国际化董事会与税收规避:审计师的调节作用。假设 H2 的理论分析表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的监督。表 4 的列(3)、(4)给出了假设 H2 的检验结果,列(3)、(4)对应的自变量分别为 GBD、GBR。从列(3)的回归结果来看,是否为国际化董事会(GBD)的系数为-0.010 7,t 值为-3.10,说明国际化董事会降低了企业避税的程度,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H1;行业专长审计师与企业避税活动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02 4,t 值为-2.98),说明行业专长审计师可能利用其对行业的特有知识抑制了企业的避税活动;国际化董事会和审计师行业专长的交乘项(GBD×AUD)与企业避税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 0.010 9,t 值为 2.59),说明行业专长审计师能够调节国际化董事会对避税活动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行业专长审计师与国际化董事会在监督管理层经营活动方面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假设 H2 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在列(4)的结果中,董事会国际化程度(GBR)与企业避税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64 4,t 值为-2.98),行业专长审计师与企业避税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02 2,t 值为-2.88),董事会的国际化程度与行业专长审计师在 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 0.050 9,t 值为 2.01)。列(3)、(4)的回归结果联合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H1 和 H2。

在控制变量方面,列(3)与列(4)的结果大致相

同。投资收益比例(INCINT)、海外收入比例(OVEINC)、独立董事比例(INDR)、资产收益率(ROA)、账面市值比(MTB)与企业避税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固定资产比例(PPE)与企业避税在 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SIZE)、自由现金流(CFO)与企业避税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存货比例(INVINT)与企业避税在 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 (四)进一步的检验

我国 2008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企业的所得税率,这一变化可能会使税法变更更前享受低税率的企业在税法变更后具有强烈的避税动机,国际化董事会对避税行为的影响也可能在税法变更前后发生变化。为了检验国际化董事会在税法变更前后对避税的影响,我们设定了税法变更的哑变量 TAXCHGE,即以 2008 年为界,2008 年以前 TAXCHGE=0,2008 年及以后 TAXCHGE=1,分组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税法变更前后,是否为国际化董事会 GBD 与企业避税均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董事会的国际化程度 GBR 在税法变更前与企业避税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税法变更后与企业避税在 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系数检验表明,GBD 和 GBR 的系数在税法变更前后均无显著差异,说明考虑了税法变更的因素后,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依然显著。

表 5 国际化董事会、行业专长审计师与企业避税:税法变更的检验

变量	自变量GBD				自变量GBR			
	(1)TAXCHGE=0		(2) TAXCHGE=1		(3) TAXCHGE=0		(4) TAXCHGE=1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GBD	-0.0117*	-1.67	-0.0048*	-1.94				

(续表 5)

GBR					-0.0702*	-1.87	-0.0367**	-2.45
PPE	0.0154**	2.32	0.0263*	1.87	0.0153**	2.33	0.0264*	1.88
INVINT	-0.0196*	-1.83	-0.0124	-1.17	-0.0198*	-1.85	-0.0124	-1.17
INTINT	0.0130	0.442	0.0246	1.35	0.0127	0.77	0.0245	1.35
INCINT	0.4925***	5.83	0.3526**	2.43	0.4923***	5.73	0.3518**	2.43
OVEINC	0.0088**	2.15	0.0091***	3.17	0.0084**	2.09	0.0093***	3.22
FIRST	0.0049	0.77	-0.0070*	-1.77	0.0050	0.77	-0.0068*	-1.72
INDR	0.0707***	2.81	0.0329**	2.26	0.0694***	2.82	0.0327**	2.25
BOARD	-0.0043	-0.84	-0.0045	-1.14	-0.0043	-0.82	-0.0045	-1.11
DUAL	0.0069	1.50	-0.0016	-1.23	0.0069	1.51	-0.0016	-1.24
SIZE	0.0002	0.06	-0.0062***	-7.82	0.0001	0.03	-0.0063***	-7.81
LEV	-0.0004	-0.07	0.0095***	3.87	-0.0005	-0.09	0.0095***	3.86
CFO	-0.0676***	-9.38	-0.0817***	-4.10	-0.0673***	-9.47	-0.0814***	-4.09
ROA	0.6463***	22.84	0.6164***	23.19	0.6469***	22.92	0.6165***	23.22
MTB	0.0418***	4.36	0.0476***	6.85	0.0421***	4.25	0.0477***	6.83
ST	-0.0022	-0.41	-0.0018	-0.34	-0.0021	-0.40	-0.0018	-0.33
MKT	0.0012	1.01	-0.0003	-0.97	0.0012	1.02	-0.0003	-0.94
STATE	-0.0077***	-2.81	0.0010	0.54	-0.0078***	-2.80	0.0009	0.47
CONS	-0.0494	-0.50	0.0994***	4.40	-0.0469	-0.49	0.0998***	4.39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193		8024		3193		8024	
R-squared	0.4221		0.3502		0.4220		0.3504	
F(p-value)	62.18*** ( $<0.0000$ )		73.85*** ( $<0.0000$ )		62.22*** ( $<0.0000$ )		73.97*** ( $<0.0000$ )	
Coeff diff. test(t-value)	0.0048(0.78) [Before taxchange V.S After taxchange]				0.0220(0.67) [Before taxchange V.S After taxchange]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双尾),所有回归的 t 值均依据 Peterson(2009)进行了 two-way cluster 调整。

#### (五)稳健性检验

1.对企业的避税程度采用会-税差异 BTD 进行度量(李维安、徐业坤,2013;刘行、叶康涛,2013)。将 BTD 代入模型(1)、(2)的回归结果表明,假设 H1 和假设 H2 都是成立的(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予报告,留存备案)。

2.在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分别对国际化董事会进行缩小范围和扩大范围的测试。缩小国际化董事会范围(只考虑国际化董事会中的外国人)和扩大国际化董事会范围(进一步将华裔纳入)的结果表明,采用不同范围的国际化董事会进行度量,研究结论都是成立的(限于篇幅,检验结果未予报告,留存备案)。

3.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PSM)控制内生性问题。由于外籍董事可能并非外生给定,公司治理完善的企业更可能吸引外籍董事加入,组成国际化董事会,因而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避税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

内生性问题。近年来,会计与财务的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PSM)来控制内生性问题(Amrstrong et al.,2010),我们也采用这一方法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第一阶段的配对中,我们选取了如下变量估计董事会是否聘请外籍人士:(1)外生变量 OFFAIR 为公司办公地 100km 之内机场的个数(用来衡量公司注册地的交通便捷度),POP 为公司所在省份人口的自然对数(用来衡量公司所在地的人力资源丰富度),GDP\_PC 为人均 GDP(用来衡量公司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2)公司治理特征变量为大股东持股(FIRST)、独立董事比例(INDR)、董事会规模(BOARD)、两职合一(DUAL);(3)财务特征变量为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境外机构或个人持股比例(FSHR)。上述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 6 的第一阶段,可以看出,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假设 H1 和 H2 依然成立。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较为稳健和可靠的。

表6 国际化董事会、行业专长审计师与企业避税:PSM 检验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GBD	(2)GBR	(3)GBD	(4)GBR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OFFAIR	0.2407*** (6.04)				
FSHR	6.3679*** (20.78)				
POP	0.3377*** (4.26)				
GDP_PC	0.0915 (0.77)				
GB		-0.0099*** (-3.19)	-0.0539*** (-3.73)	-0.0173*** (-3.80)	-0.0877*** (-3.73)
AUD				-0.0096** (-2.32)	-0.0062* (-1.67)
GB×AUD				0.0173*** (3.45)	0.0679** (2.50)
PPE		0.0364*** (2.64)	0.0368*** (2.65)	0.0367*** (2.67)	0.0359*** (2.62)
INVINT		-0.0131 (-0.64)	-0.0130 (-0.63)	-0.0120 (-0.59)	-0.0119 (-0.58)
INTINT		0.0413 (0.92)	0.0425 (0.94)	0.0363 (0.84)	0.0386 (0.88)
INCINT		0.6548*** (5.49)	0.6513*** (5.40)	0.6558*** (5.52)	0.6552*** (5.43)
OVEINC		0.0044 (0.62)	0.0045 (0.63)	0.0059 (0.80)	0.0057 (0.74)
FIRST	0.7548** (2.50)	0.0148* (1.70)	0.0166* (1.90)	0.0156* (1.74)	0.0179** (1.98)
INDR	0.0752 (0.08)	0.0748*** (3.89)	0.0729*** (3.69)	0.0755*** (3.92)	0.0745*** (3.70)
BOARD	1.1170*** (4.30)	0.0244* (1.76)	0.0250* (1.81)	0.0243* (1.78)	0.0249* (1.80)
DUAL	0.3572*** (3.33)	0.0007 (0.31)	0.0003 (0.12)	0.0010 (0.39)	0.0003 (0.12)
SIZE	0.0784* (1.87)	-0.0049** (-2.10)	-0.0053** (-2.40)	-0.0050** (-2.16)	-0.0053** (-2.39)
LEV	-0.4838** (-2.41)	-0.0039 (-0.52)	-0.0042 (-0.57)	-0.0035 (-0.47)	-0.0044 (-0.60)
CFO		-0.0634** (-2.23)	-0.0609** (-2.18)	-0.0621** (-2.20)	-0.0600** (-2.18)
ROA		0.5111*** (9.49)	0.5127*** (9.51)	0.5130*** (9.84)	0.5126*** (9.54)
MTB		0.0473*** (5.87)	0.0492*** (6.37)	0.0483*** (6.05)	0.0494*** (6.76)
ST		0.0168** (2.44)	0.0191** (2.48)	0.0181** (2.26)	0.0202** (2.32)
MKT		0.0008 (0.65)	0.0009 (0.76)	0.0008 (0.68)	0.0008 (0.76)
STATE		0.0030 (0.68)	0.0023 (0.54)	0.0030 (0.66)	0.0023 (0.53)

CONS	-14.5606*** (-6.12)	-0.0108 (-0.32)	-0.0056 (-0.16)	-0.0069 (-0.20)	-0.0041 (-0.12)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217	1324	1324	1324	1324
Pseudo R <sup>2</sup> / R-squared	0.1850	0.3515	0.3522	0.3558	0.3545
LR chi <sup>2</sup> / F(p-value)	930.58*** ( $<0.0000$ )	8.80*** ( $<0.0000$ )	8.90*** ( $<0.0000$ )	8.55*** ( $<0.0000$ )	8.56*** ( $<0.0000$ )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双尾),所有回归的 t 值均依据 Peterson(2009)进行了 two-way cluster 调整。

## 五、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一) 研究结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国际化董事会的治理作用、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国际化董事会可以发挥监督作用,督促企业合法经营,依法承担社会责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通过手工收集 2004~2012 年我国上市公司国际化董事会的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显著减少了企业的避税行为,而且行业专长审计师调节了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本文为探寻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了公司治理机制交互作用的研究,为税务和监管部门提高执法效率和监管效果提供了理论支持。

### (二) 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1)本文为董事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以往关于企业避税的研究尽管注意到公司治理对避税行为的影响,但没有从董事会治理的角度进行分析。董事会是为缓解代理问题而设置的一种治理机制,董事会治理效率的高低会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本文选取董事会的国际化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这一发现对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效率具有重要启示,监管部门可以利用董事会的治理能力来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2)本文为提高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实施绩效提供了思路。在经济新常态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本文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可以为企业战略咨询和监督服务,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因此,对于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来说,聘请外籍人士组成国际化董事会可以提高治理效率,提升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和树立良好的形象。(3)本文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方向。公司治理机制由内外部的治理机制共同组成,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会产生交互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行业专长审计师可以调节国



际化董事会对避税的影响。对于公司而言,其可以借助外部审计、法律制度等外部治理机制参与公司治理,提高治理效率。监管部门应注意到不同治理机制之间交互作用的机理,在政策制定上系统考虑治理机制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完善。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在研究中主要关注了董事会引进海外董事所组成的国际化董事会。事实上,有部分中国董事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和求学经历,他们在战略选择和经营方略上也与本土董事存在一定的差异,限于数据收集的时间和成本等因素,本文尚未考虑这些董事。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尝试分析这些董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此外,今后还应重点关注具备哪些特征的外籍人士更可能被聘为董事、外籍董事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处事方式又会与中国董事产生怎样的交互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分析和解答。

### [参考文献]

- [1] Bankman J. The Tax Shelter Problem [J]. National Tax Journal, 2004, 57(04): 925-936.
- [2] Desai M A, Dyck A, Zingales L. Theft and Tax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84): 591-623.
- [3] Schön W. Tax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 Legal Approach [M] // Schön W. Tax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8.
- [4] Masulis R W, Wang C, Xie F. Globalizing the Boardroom - Th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or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2(53): 527-554.
- [5] Oxelheim L, Randoy T. The Impact of Foreign Board Membership on Firm Value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3(27): 2369-2392.
- [6] Hanlon M, Heitzman 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50): 127-178.
- [7] Chen S, Chen X, Cheng Q, Shevlin T.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95): 41-61.
- [8] Dyreng S D, Hanlon M, Maydew E L. The Effects of Executives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85(04): 1163-1189.
- [9] Fan J P H, Wong T J. Do External Auditors Per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5, 43(01): 35-72.
- [10] 吕冰洋, 郭庆旺. 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 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02): 76-90.
- [11] 甘强生, 姚巧燕, 高玉强. 企业所得税征管: 问题与对策 [J]. 经济与管理, 2012, 26(06): 84-87.
- [12] Slemrod J. The Economics of Corporate Tax

Selfishness [J]. National Tax Journal, 2004, 57(04): 877-899.

- [13] Phillips J D. Corporate Tax - Planning Effectiveness: The Role of Compensation-Based Incentive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3, 78(03): 847-874.
- [14] Armstrong C S, Blouin J L, Larcker D F. The Incentives for Tax Planning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2(53): 391-411.
- [15] Rego S O, Wilson R. Equity Risk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2, 50(03): 775-809.
- [16] 吴联生. 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 [J]. 经济研究, 2009(10): 109-120.
- [17] 罗党论, 魏 翥.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南方经济, 2012(11): 29-39.
- [18] 李维安, 徐业坤. 政治身份的避税效应 [J]. 金融研究, 2013(03): 114-129.
- [19] 范子英, 田彬彬. 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 [J]. 经济研究, 2013(09): 99-111.
- [20] 刘慧龙, 吴联生. 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 [J]. 管理世界, 2014(04): 42-52.
- [21] Desai M A, Dharmapala 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Firm Valu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9, 91(03): 537-546.
- [22] 江轩宇. 税收征管、税收激进与股价崩盘风险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3, 16(5): 152-160.
- [23] 吕 伟, 陈丽花, 隋 鑫. 避税行为干扰了市场对信息的理解吗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 33(10): 13-20.
- [24] 戴德明, 王小鹏. 所得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来自中国2008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财贸研究, 2011(01): 119-126.
- [25] Gillies J, Dickinson M. The Governance of Transnational Firms: Some Preliminary Hypotheses [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9, 7(03): 237-247.
- [26] Staples C L. Board Globalization in the World's Largest TNCs 1993-2005 [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7, 15(02): 311-321.
- [27] 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03): 571-610.
- [28]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1.
- [29] Parsons T.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M].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0.
- [30] 吕 伟, 陈丽花, 余名元. 商业战略、声誉风险与企业避税行为 [J]. 经济管理, 2011, 33(11): 121-129.
- [31] Dhaliwal D S, Gleason C A, Mills L F. Last-Chance 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the Tax Expense to Meet Analysts' Forecast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4, 21(02): 431-459.

[责任编辑: 高 巍]